

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笔谈(之三)

## 文学,以什么样的姿态“破圈”

□ 蔡自强

“

文学“破圈”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社会轰动效应的简单复归,更在于文学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理想读者的真正扩充,在于真正深入细致的阅读。文学“破圈”的根本依靠始终是文学作品的质量。只有文学作品的质量足够过硬,其“破圈”传播的效果与作用才会更加强大、扎实

”

## 文学“破圈”的复杂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媒介语境的变化和文化产品的多样发展,文学书籍的单本平均销量不断下降。甚至有些书籍只有编辑、作者以及作者附赠的朋友阅读。这一事实残酷地揭示了当今文学书籍的落寞处境。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当今文学书籍的出版量大得惊人,仅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成千上万,而散布在网络上的各种文学作品也有着可观的阅读数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今文学又是繁盛的。陈晓明2008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似乎仍有面向此刻的针对性。

再往前追溯,“文学死了吗”在21世纪初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当代文学界掀起一股讨论热潮,而关于当代文学边缘化或“失却轰动效应”的忧患,则可能要早自1988年王蒙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就已成形。“过剩与枯竭”构成了一组如此悖谬甚至荒谬的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正视,进而严肃思考其症结所在。逐渐清晰起来的批判矛头,指向了三个方面:第一,对于“纯文学”观念的本质化或偏执化理解。第二,市场化的逻辑以及消费主义的语境。第三,“以印刷文明为主导”向“以视听文明为主导”过渡,以及在此过程中新媒体对于文学的冲击。但尽管像“文学死了吗”这样的话题被煞有介事地认真讨论,学者讨论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辨析“文学是否已死”,而是在确认文学并不会死的前提下,研判当代文学的新处境、遭遇的新冲击,出发点仍是捍卫文学的价值与存在理由。恰恰是在“文学将死”的压力下,希利斯·米勒反而更为着重地论证了文学何以不会死的种种独特特质,因而说出以下饱含感情与气势的话:“文学虽然末日降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彦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无独有偶,陈晓明在“文学死了吗”这样的话题下,重点论证文学性的弥散以及文学如何构成了社会其他文化类型的根基,这些思考以“文学的幽灵化”而得以集中呈现:“我要说的‘文学的幽灵化’,是指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也许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思考‘大文学’和‘泛文学’的概念。”(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无论如何,文学在当今文化结构中的相对式微,仍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省思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文学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而要同周围世界发生深刻关联。在无限跃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不断增强自己的活力。文学的圈子化发展既是文学现实境遇的结果,又造成文学进一步的落寞,从而更加圈子化。时至今日,对于文学“破圈”发展的呼声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各界对于文学的期许,也成为文学从业者的深重忧患,更是文学自身因应时代与环境变化必然采取的自救举措。打破文学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提升文学作品的历史感、现实性,增强文学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声。立足新时代,如何在理论思辨之外,真正适应消

费主义时代和新媒体语境对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的重大影响,重新锚定自身位置,主动破圈,将目前的压力转变为发展动力,就成为摆在新时代文学面前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需要走出自我循环,走出狭隘的圈子,“主动出击、主动输出,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从而最终走向广阔的现实与无边的人民,最大限度在全社会彰显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 文学“破圈”的一些尝试

事实上,最近几年,文学“破圈”传播确实已经成为引起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现象。文学传播的媒介新变有着多种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就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媒介并不只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本身即是信息,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媒介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破圈”传播断然离不开新媒介的支持,事实上文学整体性地已经生活在媒介化环境之中。不夸张地说,文学的未来即蕴藏在文学与媒介的互相适应过程之中。考虑到这一点,在艾布拉姆斯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的基础上,理应加上“媒介”这一新的要素。

可喜的是,目前看到的文学“破圈”传播的案例不仅种类繁多,也确实已经取得一定的“轰动效应”。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图书销售模式的革新。依托于各种垂直类平台和各类知识主播,“知识型带货”和“文化带货”风靡一时,不仅极大地带动了包括文学图书在内的各类图书的销量,而且一定程度上在全社会普及了文学知识和文学审美,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推动文学在全社会的阅读与接受。各种线上销售渠道的开通,各种线上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与品鉴会,各种作家与评论家参与其中的线上论坛、讲座等等,无疑都在大幅度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扩大着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文学盛典的隆重举行。面目焕然一新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舞台艺术有机结合,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的形式面向全社会,最大限度拥抱广大读者,实现文学的“破圈”传播。文学奖本身即是推动文学“破圈”传播的传统方式,通过将颁奖典礼予以舞台化,在捍卫文学价值与尊严的同时,文学奖项的“破圈”动能无疑更强了。各个出版社、杂志社等也都积极推出典礼类的活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文学·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文学跨年盛典”“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在阳历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借助直播,通过多种方式掀起文学热潮。

再次,文学纪录片、作家真人秀等视听作品不断涌现。《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等视听作品,让作家、评论家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不仅是对

作家的纪实性呈现,还有利于对作家“灵气”的捕捉与放大。当作家操着特定方言或特定口音的普通话出现在荧幕上,作家的“声音”就取代其文字,成为读者或观众的关注点,进而成为读者进入作品阅读的重要契机。

此外,文学作品的跨媒介传播成为热潮,甚至成为基本的行业共识。出版社在制定文学作品营销方案时,不断试水“破圈”融合传播的方式方法,跨媒介传播、融合传播已成为基本的营销思路。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在纸书热销的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相关方面还注重开发同名电子书、音视频产品等多元传播衍生品,策划同名“红色剧本杀”等“破圈”文学活动。事实也证明,跨媒介传播的确推动了文学作品的广泛“破圈”。

## 文学“破圈”的可能路径

在文学“破圈”传播已成共识也已经有所成就的时刻,文学如何更好地“破圈”传播,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已有不少针对文学“粗糙化破圈”的反思声音出现。在他们看来,文学依托新媒体实现“破圈”传播自是大势所趋,但文学在这种“破圈”传播中是否真正捍卫乃至扩大了文学自身价值,却是亟待严肃探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破圈”传播始终应以维护和捍卫文学自身价值为第一考虑,不应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有意或无意地削足适履,损害文学自身价值。

毫无疑问,在目前这个媒体融合的时代里,文学应该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主动寻求跨媒介传播,尽最大可能光大文学的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仅就文学的影视改编来看,自鲁迅的《彷徨》、茅盾的《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名篇,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红色经典”,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胜枚举的小说作品,都纷纷被改编为影视剧。在文学与影视的双向赋能中,中国的文艺星空变得璀璨繁茂。立足新时代,尤其需要文学“从惯常工作路径走出来,不断拓宽文学的边界,释放文学的潜能,充分发挥文学在各类艺术门类中的‘母本’作用,促进新时代文学的多维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内核性力量”(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20期),这就对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文学“破圈”传播,亟需重建文学与时代的关联,真正与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作家需要提高处理时代议题的能力和穿透时代信息的思想力度。立足新时代,在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里,由高铁、现代物流、移动终端等为具体表征的新现实,已经强有力地改变了旧有的时空观。因此,文学应该因时因势而变,努力跟上时代的变化,而不是坚持所谓的“以不变应万变”,死守着旧有的边界与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纯文学”观念及其偏执化发展受到质疑、饱受批评。文学创作不能在时代与现实面前失语,也不能在内容和趣味上进行“自我隔离”。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文学强大的吐纳能力的复归。而敢于面向现实、处理现实议题,直面现实生活中的成就和问题,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重建与时代的关联,文学才能真正触动广泛的人心,从而再度凝聚自身的力量。

此外,传统文学如何借鉴类型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已经成熟的叙事方法,打通传统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界限,也是文学“破圈”的一个可能取向。

归根结底,文学“破圈”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社会轰动效应的简单复归,更在于文学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理想读者的真正扩充,在于真正深入细致的阅读。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则在于提升国民的整体文学理解水平和审美层次,从而助力人民群众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为其提供另一处具有审美意味的生活空间。因此,文学“破圈”的根本依靠始终是文学作品的质量。只有文学作品的质量足够过硬,其“破圈”传播的效果与作用才会更加强大、扎实,也才能更好地担负成为各艺术门类“母本”的使命。在此意义上,文学“破圈”传播要始终不渝抵制可能出现的泛娱乐化和唯流量化倾向,始终不渝捍卫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 声音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尤其强调有感而发,因此有“感物吟志”“为情造文”“不平则鸣”“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等说法。这些说法的具体言语语境有异,但都强调了文学写作的发生,必须建立在写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有所感触的基础上。作家心有所感,于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然后才催生出具有艺术美的文学作品。

具体说来,“有感而发”的“感”、“为情造文”的“情”从何而来呢?从现实生活中来。这个“现实生活”,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既包括“自然景观”,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也包括“社会景观”,如“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冲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作家平时就处在一定的生活之中,有时候还为了有一定的题材专门去深入生活,进行着创作素材的积累。因此,文学创作的生活积累又分为两类:一种是长期的“无意积累”,另一种是专门的“有意积累”。但光有泛泛的积累还不够,作家真正开启创作还需要一个触发点,一次刺激。秦牧在《艺海拾贝》中就以小羊喝奶的细节为喻来说明这样一个写作道理:文学创作要有生活的积累,要有一次“刺激”。这样,长期积累的素材和情感,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突破口。

对文人来说,这种“刺激”是珍稀资源,不是说有就有的,那是一种特殊体验。它需要你日积月累的体验作为基础,需要你对于写作对象的深入思索作为前提。更重要的是,这种“刺激”虽然可能来自外在的因素,但却跟写作者的内在情感相互契合、相互激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写出的才是自己真正的情感,是因为情感的需要而开启写作。此乃真正的“为情造文”。

当下的文坛中,不乏真诚的作家、真挚的作品。他们之中,有的甘愿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不理睬文学潮流的起伏跌宕,认真打磨自己内心真正要写的那一部作品;有的为了创作一个题材的作品,长期地深入生活,进行丰富的素材积累,并持续地寻找写作的突破口。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虽然每日从报刊、从网络能看到海量文章,但许多文章好像不是发自作者内心而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有的写作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应付一些编辑的主题约稿,为了给一次采风活动交差,这样的写作大都有“任务”之嫌。当然,即使为了完成任务,也有作家能够积极调动自己的积累和经验,写出了漂亮的文章,甚至成为名篇。但是,大多数的“任务式作品”都写得怎么样,对于这不是出于他们的本心,这让我想到鲁迅所说的,“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自己给自己下达任务,可以不可以呢?比如,必须每天写一两千字,雷打不动。这似乎无可厚非,特别是学徒期,坚持勤苦练笔自然是好事。可是,像网络作家那样,必须每天更新,被一种“机制”逼着写作,是不是好处、坏处并存呢?

对有些作家而言,写作变成了一种“生产”。他们好像不是文学家,而是一批生产商,夜以继日地构思,写作,发表,清点稿费。书房变车间,作品变产品,难免悲剧发生,粗制滥造,浪费纸张。尤其是一些专写历史典故的杂家,他们一篇接一篇推出历史典故,通常开头一段古史轶事,末尾一两句个人感想,低成本,高效率,好发表,易转载。老实说,那些典故看似深奥,在历史学家眼里是“小儿科”,在稍有点文化的人眼里也是“炒冷饭”,就是寻常百姓,偶尔读来感觉有点新鲜,久而久之便味同嚼蜡。

有的写作是为了“约稿”。手机上时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请给我投一票,我参加了××诗歌大奖赛”云云,写诗难道是为了评奖?太把这种网络投票的大奖赛当真,不太合适。还有,有的人急于发表,确认自己作家“身份”,竟恶意“复制”别人作品,这恐怕是文坛上最糟糕的事了。还有的诗人,把参加A地诗歌大赛的稿子稍微一改,比如改一下地名和习俗,然后又投到B地诗歌大赛。这样的“写作”还称得上写作吗?

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作家内心受到真正的触动而写出来的。屈原“发愤”而写就《离骚》,司马迁心怀志向而著《史记》,曹雪芹受“刺激”创作千古《红楼梦》……他们的作品中有时代、有自我,感染了一代代读者。因此,对于当下的写作者而言,不必勉强地进行创作,你没有那份情要表达,就不要“为文造情”、矫揉造作。更进一步地,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作的那份才华,就不要着急地挤入写作圈子,先脚踏实地生活,踏实地积累。积累够了,情感有了,文学自然就来了。

文无定法,唯情满自溢耳!坚持“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作协副主席)

## 「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

□ 李秋生

##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

## 第二届北京国际文学院院长创新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9月6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老舍文学院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北京国际文学院院长创新交流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红文,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北京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周敏以及10余位中外高校文学院院长代表、作家、汉学家等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活动由北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主持。

本届交流会秉承开放、合作、共享的原则,致力于助推海内外文学院院长携手共建互联、和谐、兼容的全球文学新生态。北京市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向参会各机构发起“国际文学院院长联盟”倡议。

陈宁在致辞中说,此次交流会致力于于各国文学培养机构提供一个持续成长的平台。期待各国文学工作者以此为基础,深化国际文学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放大文学机构聚集效应,形成人才队伍资源优势,探索出一条“合作成长、共同奔赴”的新路。

李红文谈到,中图公司同北京市文联已开展了长达四年的战略合作,有力推动了北京文学走向世界。此次中图公司携手北京市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打造“国际文学院院长联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领域深度合作,增进中外文学界的沟通与互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

会上,中外嘉宾围绕“文化传承语境下的包容性文学创新”“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学创作与传播”“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创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表示,文学缩短了各国读者之间的距离,形成跨文化的心灵沟通。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创作者之间的交流已成为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进一步深化文学院院长同行之间的合作十分必要。期待各方携手努力,在人才培养和文学研究等多领域探索合作模式,共同推动文学的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

据悉,联盟创立后将通过举行国际文学活动、举办院长联席会议、开展作家互访与驻留、共享文学资源、搭建文学研究合作平台等方式,努力发掘文学的时代价值并扩大传播。

## 长篇小说《南泥湾》在京首发

本报讯 咏慷长篇小说《南泥湾》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南泥湾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发源地,也是南泥湾精神的诞生地。《南泥湾》以延安大生产为背景,讲述了军民共同奋斗努力,将“烂泥湾”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的光辉事迹,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进行了文学性阐释。

军旅作家田瑞昌表示,南泥湾精神是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小说《南泥湾》颇具匠心、独辟蹊径,生动再现了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几十年斗争风云,精心刻画出身份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是一部能够给人以深刻历史感悟与精神启迪、具有独到特色与艺术品位的小说。

傅前哨、邓津等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谈到,《南泥湾》以几代人的的人生足迹为脉络,从开发南泥湾到新疆屯垦戍边,再到开发建设北大荒,是对南泥湾精神的传承、光大与发扬。

(张雪妍)

## 《港漂记忆拼图》新书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9月2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在得到和失去中重新选择生活——吟光《港漂记忆拼图》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教授李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科幻作家宝树、《长篇小说选刊》主编朱海嵩等参加活动。

长篇小说《港漂记忆拼图》以香港的文化想象和港漂记忆为基底,创新性地将科幻设定与昆曲美学相结合,采用“分布式叙事”,每个篇章都是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同样的邂逅、相聚、分别,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可能是不同的故事,可谓一

## 黑龙江文学馆创新文化服务形式

本报讯 近日,为期22天的沉浸式阅读体验活动在黑龙江文学馆“纯文学小屋”收官,超2000人次走进活动现场,进行深度阅读,感受文学魅力。

“纯文学小屋”是黑龙江文学馆为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及龙江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公益性,围绕“1个中心+5个基地”建设方针所打造的公益性阅读空间,并于近期启动了沉浸式阅读体

验活动。观众可在开馆期间随时走进“纯文学小屋”进行阅读,书目包括《人民文学》《收获》等上百种文学期刊,《呼兰河传》《人世间》等百余部龙江文学经典以及百余部世界文学名著。作为大中小学教育教学研学基地,黑龙江文学馆还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优化流程,以“参观+阅读”的模式,丰富的展陈内容、详实细致的讲解,为学生们打造了生动的“文学体验馆”。

多重空间、多重身份、多重视角……与会者多次谈到这些关键词,认为这部作品带给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阅读体验。故事中“有心人”和“无心人”的交锋,给人以虚实结合的幻境感,同时也展现出一种把文学变成综合艺术的可能方向。活动现场,作者吟光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表示自己提出先锋性的创作理念,不仅是要讲“科幻的”故事,而且要把“科幻地”讲故事,追求在叙事策略上同步革新,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未来化”。(教蔚然)